



近代 出版人的文化追求

汪家熔
著

JINDAI CHUBANREN DE WENHUAZHUIQIU

20 世纪中国出版文化丛书

广西教育出版社

20 世纪中国出版文化丛书

近代出版人的文化追求

——张元济、陆费逵、王云五的文化贡献

汪家熔 著

广西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近代出版人的文化追求:张元济、陆费逵、王云五的文化贡献/汪家熔著. —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 2002.8

(20世纪中国出版文化)

ISBN 7-5435-3523-8

I. 近... II. 汪... III. ①出版工作—文化史—中国—近代②张元济—生平事迹③陆费逵—生平事迹④王云五—生平事迹 IV. ①G239.295②K825.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61198 号

20世纪中国出版文化丛书

近代出版人的文化追求

汪家熔 著

☆

广西教育出版社出版

南宁市鲤湾路8号

邮政编码:530022 电话:5850219

本社网址 <http://www.gep.com.cn>

读者电子信箱 master@gep.com.cn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90×1240 1/32 14印张 300千字

2003年6月第1版

2003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 7-5435-3523-8/G·2678 定价:3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小 引

西方有箴言说：“最聪慧的人，必受益于他的前辈。”此言简略地说明了研究历史的重要。了解过去，才能理解现在，才能正确地走向未来。历史可以知兴替，供借鉴。但历史漫长，人生苦短。冯桂芬说“太史公论治曰：‘法后王。为其近己而俗变相类，议卑而易行也’”^①。就今天而言，近代史对我们至关重要。毛泽东同志早在延安整风时就提出：应聚集人才，分工合作地研究近百年的中国史，包括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

近百年史不仅在“近”，而且，我们今天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正是百余年来民族振兴运动的继续发展。

我国早在公元前3世纪就发明了“司南”，即指南针；唐代发明了印刷术，宋代发明了火药。这些重大发明都陆续西传至欧洲，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的《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运用》中称之为资本主义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

^① 冯桂芬：《校邠庐抗议·议采西学》。

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杠杆。”^①早期基督教对现实政权不满,却主张忍耐、驯服,期待来世,所以到四世纪二三十年代,罗马帝王君士坦丁大帝将之定为国教,加以利用。公元324年君士坦丁成为帝国惟一皇帝后,作为国家统治工具的基督教必须与之相符:使徒时代的主教制完成了罗马教会是上帝挑选的人组成的教义;9世纪罗马教会主教被称为教皇,是所谓耶稣基督在世上的代表,禁止人民思想自由,形成了中世纪黑暗。主教制下,加以当时没有印刷术,《圣经》的获得非常困难,罗马教会,即天主教规定了解教义、忏悔等诸如此类信徒与上帝的交往要通过以梵蒂冈为核心的神职人员作中介。而改革派则认为信徒凭借自己的感知领悟上帝对自己的指示,从而摆脱了梵蒂冈的控制,成为新教。新教认为信徒的感悟依靠自己读《圣经》得到,这就对《圣经》有了巨大需要,而新教正是利用了印刷术,使新教徒方便地获得《圣经》。新教的发展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发展。

但是作为四大发明的故乡,中国的火药既未作为对外侵略邻国的工具,对内也未能将阻碍社会进步的阶层炸得粉碎,却成为民间娱乐的材料,根源自然只能在我们民族的文化传统中找寻:中华民族是如此崇尚和平的民族。

印刷术和纸的故乡在中国。印刷术并未成为中国文明向前发展的巨大推动力。自唐代发明印刷术后,直到宋神宗赵顼接位后,熙宁(1068—1077)年间才解除民间刻书的禁令。开禁后社会上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47卷427页,人民出版社(以下所注出版者均注简称),1979。

刻书业发展得并不快。在文化传承方面,刻书当然作出了贡献,但在社会突变性的变革之中,如历代的改朝换代或推动社会前进的重大事件中,很少听说书籍在舆论宣传中起的作用。

在古代,识字读书是为了做官。在古代选士及科举制度之下读书人所追求的是“十年窗下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是升官发财,光宗耀祖,极少远大的视野。选士制度使绝大多数读书人仅仅关心自身的荣辱富贵,和与此息息相关的儒家经典。到科举评卷规定按朱熹注解为标准后,读书人背诵的范围就更狭小。读书人都想出人头地,想出人头地的惟一办法是把自己的思想禁锢在“朱注”里,不越雷池一步,自然就不会有多少新思想要传达给他人。而书籍是传播思想的载体,当绝大多数读书识字的知识分子眼光仅仅落在自身的升迁荣辱之时,书籍就无法起到传播文化、推动社会进步的作用。

宋代神宗熙宁(1068—1077)以后,虽然容许民间刻书,但由于既少写“闲书”的人,更少读闲书的人,所以近千年的发展,出版并不曾成为一个完整的行业。古代,有刻印匠人,但没有刻印作坊,书坊刻书不成规模。山东大学中文系刘光裕教授,是位功力极深的出版史研究者,他多年集中力量在古人文集和笔记中梳理有关出版的文字。他同意我“古代出版未曾成为一个完整的行业”的看法。他的回答是以多年搜索古代典籍得到的认识为支持的。

直至近代,出版才成为一种行业,一个与古代出版有着原则差别的行业,并在社会进步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缺一不可的角色。

近代出版与古代出版的不同,在于其追求。鸦片战争后,在民族危机面前,有了一批又一批不再是为小我而游离于社会主流之

外的读书人。他们利用出版工具呼吁人们为改变逐渐沦为殖民地的命运而奋斗,为重振中华民族的光辉而奋起。出版从此进入了与它原来坐而论道完全不同的战斗道路。近代出版紧紧投入社会变革的浪潮,成为近代社会进步不可或缺的部分和尖兵。之所以如此,根源在于社会基础有了大的变化:中国与世界的交往在扩大,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推动下,封建制度再也无法维持下去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思想逐渐在增长。

我国第一代资产阶级范畴的知识分子,在出版活动中所推行的,是寄希望于原有封建统治者能推行新政。直至戊戌维新以后,逐渐开始依靠年轻一代而重视基础教育。

中国作为古老的农业国,封建主义根深蒂固,古老的封建帝国难以融入世界发展潮流。然而,近代出版辅助了基础教育,普及民主教育,提高了人民素质。正是有了一定民主思想基础的人民,坚初不拔的共产党人才有可能以民主思想率领他们对旧社会发起攻击并瓦解它,进而建设初步繁荣的社会主义国家。而这百余年斗争的第一块铺路石,就是近代出版。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中评论出版时说:“此项工业为以智识供给人民,是为近世社会一种需要,人类非此无由进步。一切人类大事,皆以印刷纪述之;一切人类智识,皆以印刷蓄积之;故此为文明一大因子。”

进入现代,出版活动更加辉煌和壮烈,进入白刃战状态。共产党人进入了出版领域,并成为主力军。他们所从事的出版活动,紧紧地服务于民族解放运动。其活动应该用前赴后继来描述了。

现在的出版继承了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的出版事业。就出版史研究讲,最重要的就是研究这一部分:将出版事业和党的活

动紧紧结合,忠诚于党的事业。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毫无疑问,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现代出版,就经营上讲,往往不太计较,所以,当出版从计划经济转入商品经济时,现代出版事业在经营上就缺少丰富的经验可资借鉴。因此这个巨大转变,虽已有几年,而我们尚未完全熟悉。在寻找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结合点上,往往不尽如人意。1949年后至改革开放前这30年,我们习惯于出书后新华书店包销,今天交货,明天结账收钱。任务和资金周转就都完成了,市场情况与我无关。而走向市场后,现在一本书从选题到资金回笼不再有人帮忙:多印,卖剩的要准备仓库,卖不掉则血本无归,下一本书就没钱印;少印,勉强能卖完,但丝毫未赚。看见别人出书卖得火,自己跟随,却砸在手里。这都是过去计划经济所没有的、今天却必须面对的。而这些,近代出版家正是行家里手。这就是本书想探索的所在。

近代离我们不远,近代出版材料虽有短缺,但保存相对完好,尚可从中探索其产生、发展的历史,使我们了解前辈们的奋斗及其成败经验,从其轨迹中领会值得我们借鉴的宝贵财富。

“家”在称人的时候,有几种意义,于是很难分,一种解释:“掌握某种专门学识或从事某种专门活动的人:科学家、社会活动家。”另一种解释:“经营某种行业的人:农家、渔家。”于是就有“出版家”之称,不管好坏,更不管左中右,感情上不好接受。毛泽东说过,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近代社会和现代社会中,既有革命分子,也有顽固分子,也有怕树叶掉下砸破头躲在一边的人。近代出版和现代出版自然也脱离不开这一条。原上海出版文献编辑所曾做过统计,在民国时期的38年间,出版洋装书的出版社,或说出版

主体,就有 8000 余家。文献编辑所没有细分近代时期、现代时期各有多少家。这就是上面举的第二种“家”。他们被称为“出版家”,实在是随缘而来,随缘而散,并不都值得我们来搜集材料、分析研究。值得我们留意的,只能是其中极小极小一小部分,也就是上面举的第一种专门家。为了区别于上面第二种出版家,姑且称为“出版人”。他们至少要有这些条件:既然是近代出版人,必在 1920 年前就是独立出版人,并且一直到谢世都还具有出版活动。他们要对社会、对出版事业在文化上有公认的贡献。毛泽东说过,人总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我们所谈的出版人,他们有参加出版活动的冲动,而且必然不是为钱的冲动,所以还要有百折不挠的精神。这样入围的就比较少了,有五六位。为了贴切近代概念,将章锡琛、叶圣陶等排在外边:他们的开明书店,在白色恐怖时,周恩来将之列入三线,就有现代意义了。章锡琛、叶圣陶等也有很多值得我们研究的事迹。剩下的就只三位了:张元济、陆费逵、王云五。

任何文化或文化活动,绝非一个人的活动所能形成的。文化可说是水成岩,都是多少年细微的微粒沉积而成。即使火山爆发瞬间形成的火山岩,也是经过漫长的能量积聚形成的释放。在我国近 20 年间的出版史研究的著作和论文中,曾有过一种类似造神的活动,这自然是不足为训的。张、陆、王三位虽有抱负、毅力,在文化上有贡献,但毫无疑问,他们都不是三头六臂。他们作出的每项成绩,都是与他们的同伴共同努力的成果。历史上在他们三位左右,很有一些值得尊敬、以出版作为服务社会的追求的先生。其中很多都是值得为他们作传,成为我们表率的。但为了表述的提纲挈领起见,这本小册子里基本不提他们。虽然本书描述的是他

们三位,实际上他们是作为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的代表出现的。想起汉代著名经学家郑玄的《戒子书》中有一联话:“显誉成于僚友,德行立于己志。”这是儒家谈修养的思想,也是我们传统的对人对己的思想,而且符合事物的规律。在我见到的他们三位的一些书信、文章中,也随时能见到这些思想。仅仅三位出场,是为提纲挈领,读者谅不致误解;也不应该将他们三位的助手、同志和数以千计的职工的辛劳与智慧忘掉: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相信“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领袖人物则是加快了历史进程。

历史总是过去了的事情。选择这个选题,着眼却正在今天。原因有两点。拨乱反正 20 多年以来,历史唯物主义在我们的文化、政治生活中获得了应有的地位,就为研究历史提供了基本条件。但 20 年来的出版史研究并非不能挑剔:王益同志在《重视出版史的研究》一文中指出,出版界对出版“不重视学习和研究历史、认为读不读这些书无关宏旨的观点和现象是相当普遍地存在的。不重视这些书的出版发行,阅读的人很少,可以作为证明”。他又说:“研究出版史的书刊不被重视,受到冷落,有其外在的原因,也有自身的原因,有些出版史的文章质量确实不高。”^① 有一些出版通史,沿袭书史,叙述流水。一些出版史论文,热心掌故轶闻,无法深入。两者对读者均无裨益。作为文化载体的出版,研究他的历史不去研究出版中体现的文化,多少总是一种遗憾。出版的功过,只能从文化上加以判断。其次,正如王益同志批评的,出版史不被

① 王益:《重视出版史的研究》,《编辑学刊》1998 年 2 期。

出版界重视，“也有自身的原因，有些出版史的文章质量确实不高。”我想质量所以不高，或许在于脱离了现今出版的实际。出版改革中有件大事是从计划经济转入市场经济，而又要保持社会主义出版事业应有的品质。我们有时对近代出版的经营领会得并不够，有时重复他们的失误。本书力图探索近代出版人对经营和文化兼顾的做法，或不致被批评成功利主义。

目 录

小 引	(1)
-----	-----

第一章 古代出版主体的局限	(1)
---------------	-----

一、古代坊刻逐财重利	(3)
------------	-----

二、公款官刻的功与过	(13)
------------	------

三、家刻弱点在销售无门	(25)
-------------	------

四、积功累德的寺院刻书	(30)
-------------	------

第二章 近代出版人的先驱	(36)
--------------	------

一、西学:400年前引入的新词	(37)
-----------------	------

二、得自坊刻的启示	(48)
-----------	------

三、官书局的组织	(51)
----------	------

四、王韬的尝试	(56)
---------	------

五、惟一的成功者——夏瑞芳	(65)
---------------	------

第三章 近代出版第一交椅	(74)
--------------	------

一、张元济与总理衙门	(76)
------------	------

二、戊戌前后的张元济	(84)
三、张元济的出版思想	(92)
第四章 商务的成功——敬业·创新	(109)
一、学者与工人的罕见结合	(110)
二、译介传播西方学术	(115)
三、出版小说 开启民智	(126)
四、立宪图书 推动时政	(135)
五、新式课本 昌明教育	(140)
第五章 商务中华相竞相长	(166)
一、商务的第一个对手	(167)
二、陆费逵民元前小传	(171)
三、中华书局的诞生	(181)
四、竞争促进发展	(191)
第六章 质量是出版的立身之本	(199)
一、《辞源》	(201)
二、《新字典》	(212)
三、反面教员沈知方	(215)
四、《中华大字典》	(223)
五、《辞海》	(227)
第七章 文化积累 千秋功业	(236)

一、复印古籍 石印首功	(237)
二、商务中华 古籍精印	(244)
三、“一折八扣”的是与非	(261)
第八章 引领潮流	(282)
一、商务印书馆在五四	(283)
二、中华书局“民六危机”及其复苏	(300)
三、商务“王云五时代”	(303)
四、激动潮流	(305)
五、同步出版学术专著	(313)
六、普及古籍之功	(317)
七、共创文化品牌	(321)
第九章 百折不回的探索与追求	(326)
一、魂牵梦萦 商务情结	(326)
二、坚毅中华 渡过危机	(337)
三、“一·二八”商务浩劫	(348)
四、为国难牺牲 为文化奋斗	(356)
五、王云五的出版生涯	(367)
第十章 深刻的烙印	(378)
一、阶级的局限	(379)
二、“五联”投资事件	(389)
三、孤寂的智者	(395)

四、爱财与爱才	(403)
五、王云五的人生道路	(414)
第十一章 近代文化的源头	(419)
一、《林文忠公政书》	(419)
二、不算后记的思考	(424)
后 记	(432)

第一章 古代出版主体的局限

任何领域都有分期的需要。分期表明前进中的阶段。正确认识出版分期,能更好地或者说自觉地做好目前的工作而不致停留和迷失方向。

出版史的分期,目前有两种:一类按中国历史的分期做坐标。最典型当推张静庐的《中国出版史料》:《新青年》创刊号的书影,置于《中国近代出版史料》,而《新青年宣言》,置于《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一类按书籍的形态和出版社类型划分。后者都在一些论文中谈及。大致是,19世纪中叶前后,书籍的形态发生了很大变化:印刷由手工变成机器,书页由一面印变成双面印,书的开本幅面变成适应机器要求的原纸的二的倍数,装订由线装变成洋装,等等。出版行业内也发生了很多变化:有了前所未有的职业编辑、校对等行业当;由投资者组合成股份制,实行现代企业制度;等等。

显然,这两种分期都不甚妥善。以中国历史分期,只能说明“在这段时期里,出版的状态是如何的”,而不能说明这个时期出版的本质。

以书籍的形态和经济单位的变化划分,好像指出了古代与近代的变化,但毫无疑问,这些不同都是您的五官能感觉到的,因而是表象而非本质。本质是看不见摸不到的。您看到的这些同或不同不能说明固有的内在联系、内在规律,这就不是古代与近现代出版的本质区别。这种以书籍形态、经营等为标志来分期,如果还可勉强区分古代与近现代,在区分近代与现代、现代与当代就毫无办法了:进入近代后,书籍形态直到今天并无变化。至于股份制,它在新中国成立后 50 年的出版业在我国并无踪影,而这段时期,无论数量和社会贡献上,我国的出版业都是历史上最辉煌的。可见股份制“是事物的表象,是事物的比较表面的和零散的和多变的”;它不是从“本质从整体上规定事物的性能和发展方向”。可见股份制并不是区别于古代出版的必要的和必然的条件,所以它以及书籍形态变化,不是出版分阶段的科学根据。

研究一个时代,必须对前一时代有个简略认识,才能更清楚地了解后一时代。为了认识新出版,有必要简单回顾一下古代出版的特点。

出版,不论新旧,都是文化的传播,这是共性。不能忘记“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①。毛泽东还指出,“至于新文化,则是观念形态上反映新政治和新经济的东西,是替新政治新经济服务的。”^② 古代出版必然有个与近代出版不同的反映观念形态的政治与经济基础。又说,统治阶级的思想是统治思想。所以,古代出版的本质,必须要从统治我国几千年

①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直排本,688 页。

②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直排本,688 页。